

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一大突破

——简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

罗以澄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年轻学者张昆继《简明世界新闻通史》后,又推出了一部新作《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该书以其丰富翔实材料,稳妥公允的论述,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闻传播观念变迁、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进入纵深拓展阶段的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

纵览全书,笔者以为它有着以下几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一、选题新颖,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一般划分为三大领域,即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从学术研究演进的角度看,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新闻史研究为始端的。而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新闻史研究又可以分为事业史、制度史和观念史(或称思想史)三个层次。这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事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在观念上得到反映。而观念的变革,也必定会推动(或阻碍)事业、制度的演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国内大陆学者近十余年出版、发表的涉及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著作、论文便不下数千种(篇、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丰硕成果在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里分布得很不均衡。概而言之,学术界对事业史、制度史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观念史的关注;在众多新闻史研究成果中,观念史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要完善新闻史的科学体系,提升新闻史学的研究水准,加强对观念史的探讨与关注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一书的作者,正是基于对新闻史学中这一状况的透彻了解,加之其本人多年从事新闻史学教学和科研的积累与功底,选定了这一研究课题,这无疑为我国新闻学术研究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的方法论,紧密联系在传播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代表人物,诸如柏拉图、弥尔顿、罗伯斯庇尔、小野秀雄、梁启超、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学术活动和思想渊源,逐个对他们的传播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视;其中不少问题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正面论及,不仅发掘了一批鲜见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提出了作者的独特见解,从而显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二、专题深入,评述系统、公允

《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一书共设11章,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主线分列为八个专题。书中评述的这些人物都是不同时期传播观念的开山鼻祖或杰出代表,他们在整个人类传播史上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当然,这些人物的学术,体大思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先后都曾在政治、经济、哲学乃至军事、文艺等社会文化诸领域,创立了具有各自时代特色的、富有启蒙意义的博大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探究。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偏重于政治、哲学等方面,而对他们传播思想(观念)的考察则很少。有些虽然也有所涉及,然而往往是语焉不详,浅尝辄止;或者是引据片言,骤下结论,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一书在这方面做到了详人所略,言人所不及,作出了补白性的学术贡献。比如,该书从“理念与人性”、“国家与个人”、“政治技艺与说服的技艺”、“自由与控制”等四个方面,对古希腊柏拉图的集权主义传播观念的源流、特征及其实际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

再如，对约翰·弥尔顿的自由主义传播观念，该书则从“人性与自由”、“真理观”、“控诉出版检查的罪恶”、“呼唤出版自由”诸侧面进行了系统、周全的评述，具体阐释了自由主义传播观念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阶级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从中也揭示了弥尔顿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维护人类天赋权利的出版自由观念与近代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一探索，对理清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历史源流，把握其实质，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还如，对列宁的社会主义传播观念，该书则从“报刊职能观”、“新闻业务观”、“新闻事业观”、“办报方针”、“党性原则”、“出版自由观”、“宣传策略”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审视，细致地描述了社会主义传播观念的历史源流、结构框架、阶级本质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前景。通观全书，各个专题布局合理，逻辑结构较为严谨，思想辨析也较精细，举纲张目，逐层展开，节节深入，为读者展示不同历史时期传播观念的全貌，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三、史料翔实，持论有据，言之有理

《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一书所评述的人物，都是学术大家，其遗书，卷帙浩繁。其中，复述陈言与独抒创见，交间并存，难以分疏；加之，研究者的认识水准和所取视角不一；这样，对这些人物思想（观念）的诠释产生某些歧解便是自然之事。学术真理本来是在各种歧解乃至“相反之论”的多元发展和互相争鸣中展现的，关键在于持论有据，言之成理。该书对这些人物传播观念的评论，无论是独树一帜也好，还是与前人及当代学者所论相同或相左也好，都能做到以全面占有这些人物的有关思想（观念）资料为立论依据，博引详征，自成经纬。尤为突出的是，该书采用述与评相结合的方法，在融会贯通有关这些人物的传播观念的资料的基础上，先是如实陈述他们言论的主观动机、客观背景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然后再具体评论其思想价值的长短得失与历史地位，从而给人以“设身易地以求其实”，毫无“浮以求明”的牵合之感。例如：在评论小野秀雄传播观念时，认为“小野的论述是复杂的，他既愿社会进步，又反对共产主义；即有求实的论证，又有空想的成分；既有唯心主义的观点，又有唯物主义的论述；既有学者的理智分析，又有孩童般的浪漫天真。可谓良莠不齐，杂乱纷呈。然而透过现象，便可发现这一切都是以他的政治态度为依旧的。”在评论列宁传播观念时，认为“列宁的新闻思想虽然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说，但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如对新闻职能的论述，只考虑到宣传鼓动、组织和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新闻媒介的娱乐和信息传递职能；对于报业经营管理的某些见解，显然只适用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殊历史时期等等，这些局限或不足，是由于列宁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在评论毛泽东传播观念时，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说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发展，尤其其他的党报理论与列宁的党报学说密切相关”；“毛泽东新闻思想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迹。由于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形成于战争年代，这就决定了他的某些观念，可能不适应于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客观现实。如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功能的认识上，就偏重于政治作用；把新闻媒介的性质，规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该书提出的这些颇有独到见地和启迪性的见解，都是在对这些人物的传播观念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辨析、研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由于占有的资料丰富、翔实，持论铮铮有据；自然令人信服。

以上仅从该书的选题、主要观点及方法论上，略陈了其部分特色。至于在对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人物传播观念的具体分析中，该书还有许多真知灼见及可圈可点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论到。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笔者以为，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该书对一些人物传播观念的两重性花了很大功夫把握，应该说思想的两重性必有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在；对于思想矛盾体中，新与旧、是与非、正确与错误交织共处的复杂情况，既需要如实评估，但又不排斥评译者按特定的时代需要的价值取向进行阐扬。就此而言，该书在一些人物思想（观念）的评价上还显得似乎过于拘谨。还有，该书前十章是以人物分专题，最后一章则以国家为专题，致使体例上不够首尾一贯。上述意见仅是见仁见智之差异，丝毫无损于该书成为一部研究新闻传播观念史的成功之作。